



▲增加育兒補貼，有利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提振消費，促進就業，形成經濟增長的預期。

經濟觀察家

全球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4 和 2025 年連續兩年生育率回升，並且今年以來繼續保持上升勢頭。在各種生育支持政策中，發錢補貼生育是其中最重要的生育支持措施。國內外的證據均表明，發錢的力度要足夠大，才能顯著提高生育率。

加大補貼 提升生育率



梁建章

6月24日，韓國國家數據處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該國4月出生人口為24521人，按年增加18%。當月總和生育率（TFR）為0.93，按年增加0.13。報告稱，自2024年7月起，韓國出生人口已連續22個月保持增長。

1991至1995年，韓國經歷了一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達到70萬左右。到2024至2026年，這批在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結婚和生育年齡。但如果只是婚育人口增加，而生育模式不變，那麼只會導致出生人口增加而不會推高生育率，因為總和生育率的計算不受年齡結構的影響。

韓國在2021年及之前，每月育兒補貼金額僅10萬韓圓（約500元人民幣）。到了2024年初，韓國保健福祉部大幅提高了對2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希望能藉此進一步鼓勵生育。按照新規，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獲得100萬韓圓補貼（約5000元人民幣）；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萬韓圓（約2500元人民幣）補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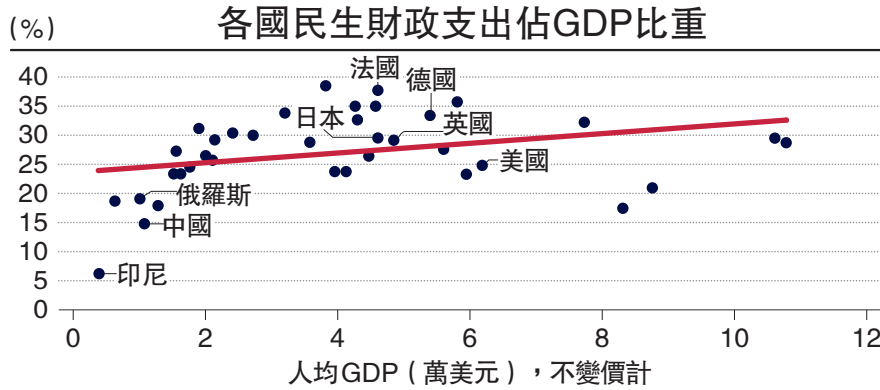
受發錢鼓勵生育影響，近年韓國結婚登記數量持續增多。2022年韓國結婚登記跌至19.17萬對；2023年結婚登記小幅回升至19.37萬對，2024年增至22.24萬對，2025年進一步增至24.03萬對。不少地方政府還為新婚夫婦提供現金獎勵。根據金山市沙下區最新政策，在政府主辦的相親活動中牽手成功並最終締結婚姻的情侶，可以獲得最高2000萬韓圓（約10萬元人民幣）的結婚獎勵金。與歐美國家相比，韓國非婚生育的子女佔比很低（2024年為5.8%），婚內生育是主流，所以結婚數量增加，也對於出生人口和生育率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

發錢還是最有效方法

除了韓國以外，國內外還有很多證據表明發錢補貼生育確實有助於提高生育率。例如，根據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數據，南歐國家用於家庭育兒福利相關的財政支出佔GDP的2%以下（個別國家在1.5%以下），生育率也普遍較低；法國和北歐國家用於家庭育兒福利相關的財政支出佔GDP的3%以上，生育率也比南歐國家高得多。

根據東京政策研究基金會和東京大學等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通過系統綜述與貝葉斯層次回歸模型，評估了國際鼓勵生育政策對逆轉生育率下降的有效性。研究納入61項國際研究後發現，對生育率提升影響最大的是現金福利政策，包括出生一次性補貼、育兒津貼、帶薪產假和陪產假、託育覆蓋及稅收減免等。這篇論文認為，如果日本大幅提高育兒現金福利，可顯著增加提升生育率的概率。

近兩年，中國也有發錢補貼生育促使出生人口回升的例子。據2026



年2月26日《湖北日報》報道：2025年，天門市鼓勵生育成效全國矚目：完善婚戀、孕育、生育、託育、教育「五位一體」政策支持體系，建立「雙月推進會」制度，全年出生人口7357人，按年增長1.94%，連續兩年正增長。

雖然2025年天門市出生人口僅增長1.94%，增幅並不算大，但這是在2024年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基礎上繼續增長，並且2025年全國以及各省份出生人口均比上一年下降。2024年天門市出生人口比2023年增長17%，而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僅按年增長5.8%。

那麼，天門市近兩年出生人口持續增長的原因是什麼呢？根據天門市衛健委於2025年11月17日發布的消息《8年來首次「由降轉增」，天門政策組合拳催動生育暖流》，2023年以來，天門市委、市政府着力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其中，疊加其他購房補貼之後，生育二孩最低補貼為15.63萬元（人民幣，下同），生育三孩最低補貼為22.51萬元。天門的例子說明，生育支持政策的力度要足夠大，才能取得顯著效果。

嚴重少子化影響創新力

中國近年來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0左右。如果不加大發錢補貼生育的力度，未來幾年中國的生育率很可能會低於韓國。嚴重少子化會加重人口老齡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對於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不斷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工作人口面臨着愈來愈沉重的稅負。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嚴重少子化對創新力和技術發展也有負面影響，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人口數量愈多，不僅總體創新力會愈強，而且人均創新力也會愈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人口年齡結構對創新力也有影響。一般來說，30多歲是最適合創業的年齡，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麼就會對其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很有幫助。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麼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

為了提高生育率，中國在2025年出台了育兒補貼政策，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

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雖然國家育兒補貼政策預示着全面生育福利的起點、值得點讚，但與高昂的育兒成本相比，目前的育兒補貼金額還是不足以顯著提升人們的生育意願。

那麼，補貼生育的錢從哪裏來？可以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是把原來投資於物的錢拿出一部分來投資於人。與多數國家作比較，中國經濟建設財政支出佔GDP比重偏高，而民生財政支出佔GDP比重則偏低。（見配圖）中國完全可以把原本計劃投資於「鐵公基」的資金，抽出一部分用來投資孩子，這非但能立刻激活國內巨大的嬰童消費市場，而且還將為未來的社保、稅收和創新提供最核心的資產——高素質的人。這種從「硬基建」向「人基建」的投資轉向，是中國目前回報率最高、風險最低的宏觀決策。這也完全符合「十五五」規劃提出的「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

成長後就業消費 反哺經濟

二是發行長期國債建立國家育兒專項基金。這個育兒基金在前期通過發行國債借錢發育兒補貼，後期則從稅收中提取一部分還債。專門用於育兒津貼的長期國債期限可定為30年左右，與一代人的時間大體匹配。發行這種長期國債，有利於體現代際公平，讓未來受益於這些勞動力的納稅人共同分擔當前成本；也有利於債務平衡，因為人口增長帶來的稅基擴大，將增強未來償債能力。

由於新生人口是生產要素、消費基數乃至未來的稅基，因此，發錢給養育家庭並不是成本，而是支持養育家庭的福利支出，可以看成社會對他們的父母養育未來納稅者的付出所做的補償。發錢給養育家庭也是公平的，因為這些家庭付出時間、精力和財力養育小孩，小孩長大後則通過消費、工作來支撐整個經濟，並通過納稅等方式直接貢獻社會。

中國已經進入物質全面充裕唯缺孩子的時期，現在投資孩子是最佳的基建。大幅增加育兒補貼，短期有利於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提振消費，促進就業，形成經濟增長的預期；長期看，出生人口的增加能夠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

當然，要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僅僅發錢補貼生育還不夠，還需要大力發展普惠託育服務、減輕家庭的教育負擔等。

（作者為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

警惕AI應用的數據安全隱患



陳迪源

創科瞭望

Anthropic 旗下 Claude Code 被揭發暗藏監控後門，人工智能（AI）編程先驅 Cursor 被自己的模型供應商「反噬」——這兩宗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筆者認為它們指向同一個結論：無論是國家還是企業，將數字命脈交由外國開源模型掌控，無異於引狼入室。建立「主權模型」已非選項，而是生存之道。

2026年7月，安全研究人員揭發 Anthropic 在 Claude Code 中暗藏追蹤代碼，在用戶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偵測其時區與代理伺服器設置，專門標記用戶是否來自中國、是否與中國AI實驗室有關聯。Anthropic 工程師其後承認，該代碼自3月起便作為「實驗」植入。

中國國家信息安全漏洞庫隨即發出警告，指特定版本的 Claude Code 存在後門風險，可以在未經授權下將用戶地理位置及身份標識等敏感信息傳輸至遠端伺服器。阿里巴巴等科技巨頭迅速將其列為高風險軟件，全面禁止員工使用。

諷刺之處在於：Anthropic 是全球最高調標榜「AI安全與倫理」的企業，甚至曾拒絕美國政府的監控要求。但在地緣政治與商業利益面前，它同樣毫不猶豫地越過隱私紅線，針對特定國家用戶實施隱蔽監控。換言之，所謂的「價值觀驅動」不過是商業包裝——當利益足夠大時，任何企業都可以變臉。試想，若政府部門、關鍵基礎設施或金融系統建立在這類模型之上，敏感數據將時刻暴露於他國企業的視野之中。這恰恰是國家必須擁有主權模型的根本原因——唯有算力、模型、數據三者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數字主權才有真正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連美國自己也深諳此理：國防數據巨頭 Palantir 與英偉達合作，以開源模型為美國政府構建自主 AI 系統，而非依賴任何一家開源巨頭。連最懂敏感數據的美國公司，也不敢把國家命脈交給商業 AI 企業——這本身就是對開源模型最有力的控訴。

如果說 Claude 後門事件揭示了國家層面的風險，那麼 Cursor 的遭遇則為所有企業敲響了警鐘。Cursor 是 AI 編程助手品類的開創者，曾是 Anthropic 最大的客戶之一。然而，Anthropic 睨見這門生意風生水起，索性親自下場推出 Claude Code 與客戶正面競爭，結果 Cursor 的市場份額從 2025 年 6 月的 41% 大跌至 2026 年 5 月的 26%，儘管收入仍在增長，最終以全股票方式併入

SpaceX。

企業一手向大模型公司付費，一手將自己的數據與知識產權拱手送上，等於花錢買 Token，卻把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餵給了明天的競爭對手。更關鍵的是，企業間若共用同一個外部模型，等於所有人都在用同一個大腦思考；長遠而言輸出將趨於同質化，競爭優勢蕩然無存。因此，企業層面的出路同樣是「主權化」，以開源模型結合本地算力進行私有化部署，從源頭杜絕數據外洩與商業機密被「蒸餾」的風險。隨著開源模型能力快速逼近開源模型，企業私有化部署的浪潮已不是「會不會來」的問題，而是「何時全面爆發」的問題。

港宜推出AI認證機制

對於香港的核心商業機構而言，Cursor 的教訓極具現實意義。一旦自身數據被用於模型訓練，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便不可逆地流入了他人的系統之中。作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化城市，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通訊基建、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及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具體來看，香港依託政務、金融、法律、醫療等專業領域的高質量本地數據，研發主權模型，服務本地產業升級是正確的選路，亦能為國家在 AI 出海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香港可以探索建立既符合國家安全要求、又與國際標準接軌的 AI 審測認證機制，為國產模型走向世界提供合規通道——這正是筆者一直倡議的「第三空間」治理邏輯：在國家安全與國際開放之間，找到一條既安全又具公信力的中間路線。

全球目前缺乏一個被廣泛信任的 AI 模型認證體系，而香港恰恰具備成為這個認證樞紐的條件：普通法體系帶來的國際公信力、與內地的制度銜接，以及對前沿技術的深度理解。香港若能扮演好這個角色，其價值將遠超一個普通的算力節點或數據中心——它將成為國家 AI 走向全球市場的信任橋頭堡。

Claude 後門事件告訴國家：開源巨頭可以隱蔽地監控你。Cursor 的故事告訴企業：模型供應商隨時可以變成你的掠食者。兩個層面的教訓指向同一個答案——把算力、模型與數據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歷史上每一輪科技革命，將核心技术控制權拱手讓人者，終究受制於人。在 AI 時代，數字主權就是國家主權的延伸，而主權模型就是這道防線的基石。看不到這一點的，終將在下一輪洗牌中淪為被收割的對象。

（作者為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創會主席）

打造國際教育樞紐 人才匯集北都



廖偉強

樓市強心針

為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內地近年在全球科研人才市場上動作頻頻。清華大學早前公布成功邀請得世界頂尖化學材料學家、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奧馬爾·亞吉（Omar Yaghi）加盟出任講座教授，消息在國際學術圈引起震盪。此前，吉林大學亦邀得另一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國生物化學家哈特穆特·米歇爾（Hartmut Michel）擔任教授，領導科研團隊攻堅創新科技。這些舉措，正是內地配合「十五五」規劃、全力推動「教育強國」戰略的具體體現。

香港要對接「教育強國」的規劃，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自然是重中之重。其中，「北都大學城」本質上就是要打造一個具國際競爭力的教育樞紐。但若要有真正做到「教育樞紐」，未來就需要有足夠的科研與學術人才進駐北部都會區，支撐其發展。

過去3年，香港的「高才通」計劃共收到逾15萬宗申請，當中近12.7萬宗獲批。表面看來成績亮麗，但根據移民公司拆解申請人向入境處申報的專業背景，創新及科技、學術研究及教育的類別合計不足兩成。當前北部都會區正

迎來擴容、而香港又要打造「留學香港」品牌時，這問題就不得不關注。

筆者相信，特區政府在未來的政策規劃中，「搶人才」助發展北部都會區，將成為政策其中一條主軸，而且吸納的數量必須比過去更大，而科研與學術人才更成為重點中的重點。

優質住屋需求增

人才聚集，城市便會形成新的需求。可以預計得到，北部都會區未來十年將迎來大量科研人員、學術團隊及相關專業人士，他們普遍屬於高端中產階層，對居住環境有明確要求：空間感、舒適度、寧靜度、環境衛生，遠比奢華配套更重要。這意味著北部都會區內質素佳、設計新、管理完善的全新屋苑，將成為這批人才落戶的首選；而打算作出針對性部署的投資者，自然也會關注市場上的北都概念優質新盤。

雖然近期市場成交減少，但資金顯然並未離場，反而在等待更穩健的入市時機。發展商計劃在此時推出北都新盤，正好迎合市場積聚的投資者購買力；難怪市場都估計項目的投資者比例會高達五成，而北部都會區絕對會是下半年物業投資者看重的市場。

（作者為利嘉閣地產總裁）



▲北部都會區內的全新屋苑，料吸引落戶北都的人才入住，前景看俏。